

十三行研究丛书
SHISANHANG YANJIU CONGSHU

國門十三行

● 譚元亨 著

Guomen Shisanhang
cong kaifang dao xianguan de nizhuan

从开放到限关的逆转

惟操守二字實難得人素何三人行必有我師也者勉

廉之一字況實事處有客之物人皆知為之者不遠

亦大奇事名等披此將這樣事竟不欺隱朕得知

應教者教應戒者戒應罪者罪則孰耐為此也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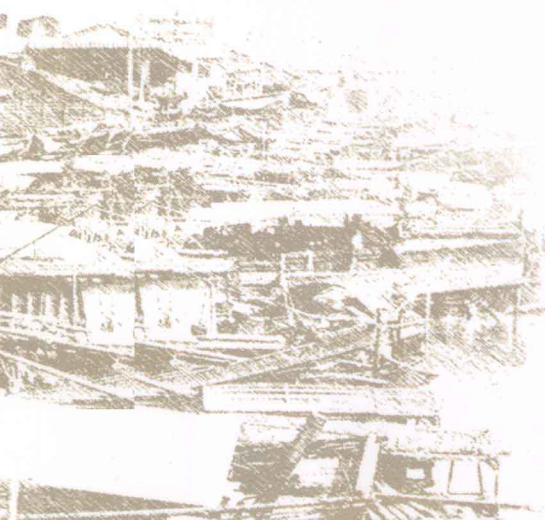
楊文乾自以為小國圖計民生巧取為名實蒙收執

不知如何能欺人耳目所稍弄巧成拙焉再不改悔

則錢至名實俱敗也所以天下事多巧詐惟一誠

格

天正餘年良景也勉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十三行研究丛书
SHISANHANG YANJIU CONGSHU

● 谭元亨 著

国门十三行

从开放到限关的逆转

Guomen Shisanhang
cong kaifang dao xianguan de nizhuan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门十三行：从开放到限关的逆转/谭元亨著.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 10

十三行研究丛书

ISBN 978-7-5623-3526-9

I. ①国… II. ①谭… III. ①十三行—研究 IV. ①F752. 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5949 号

总发行：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广州五山华南理工大学 17 号楼，邮编 510640）

营销部电话：020 - 87113487 87110964 22236386 87111048（传真）

E-mail: scutcl3@scut.edu.cn http: //www. scutpress. com. cn

责任编辑：王 磊

印刷者：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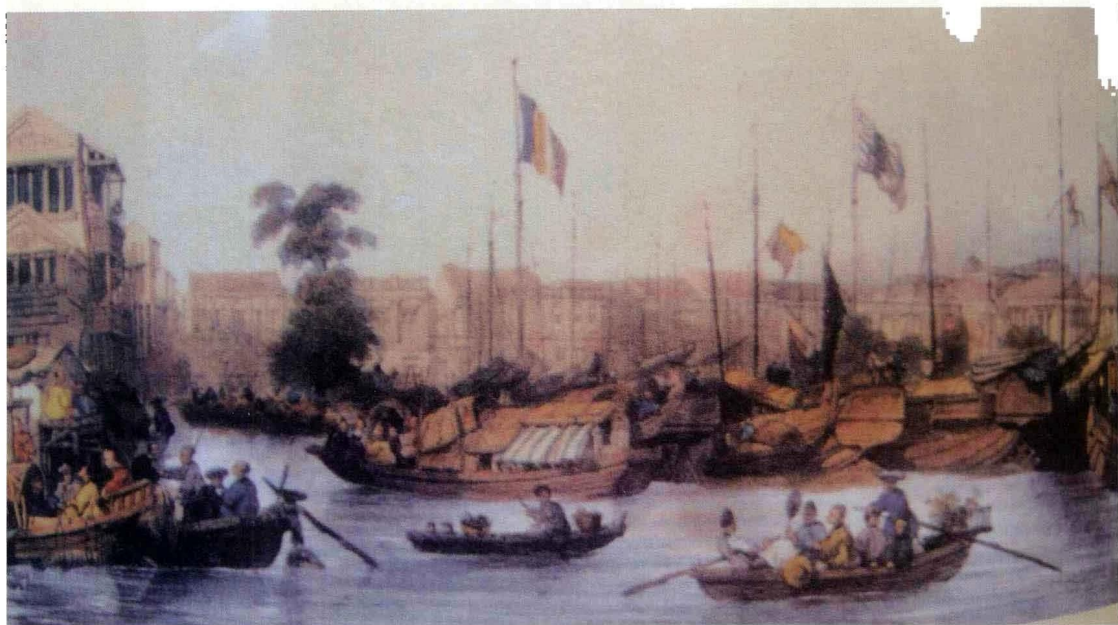
开 本：787mm×960mm 1/16 印张：15.75 插页：4 字数：319 千

版 次：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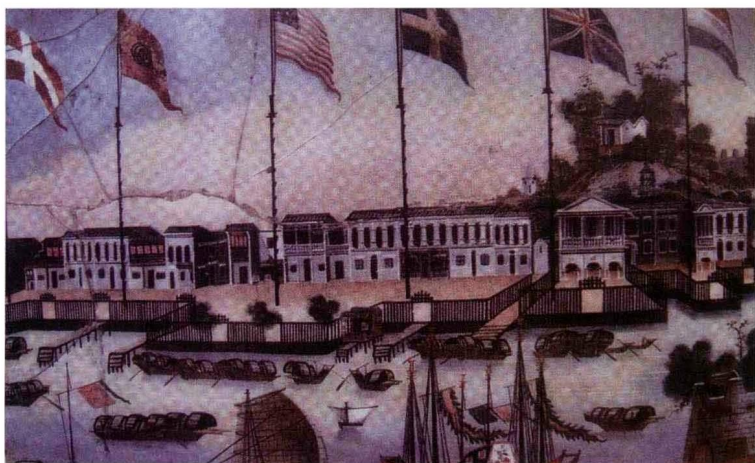
印 数：1 ~ 1000 册

定 价：36.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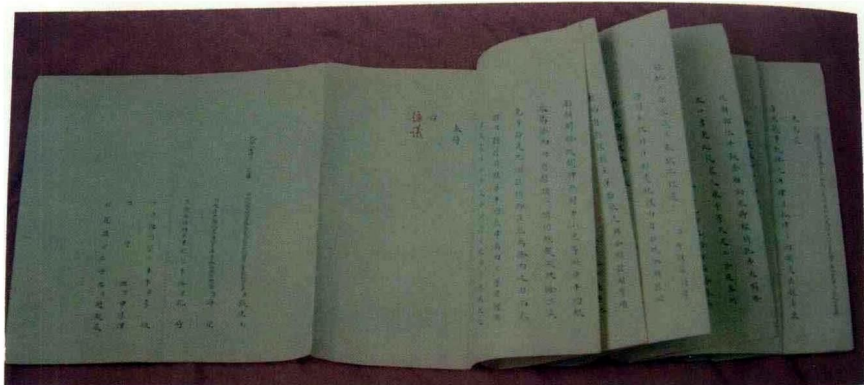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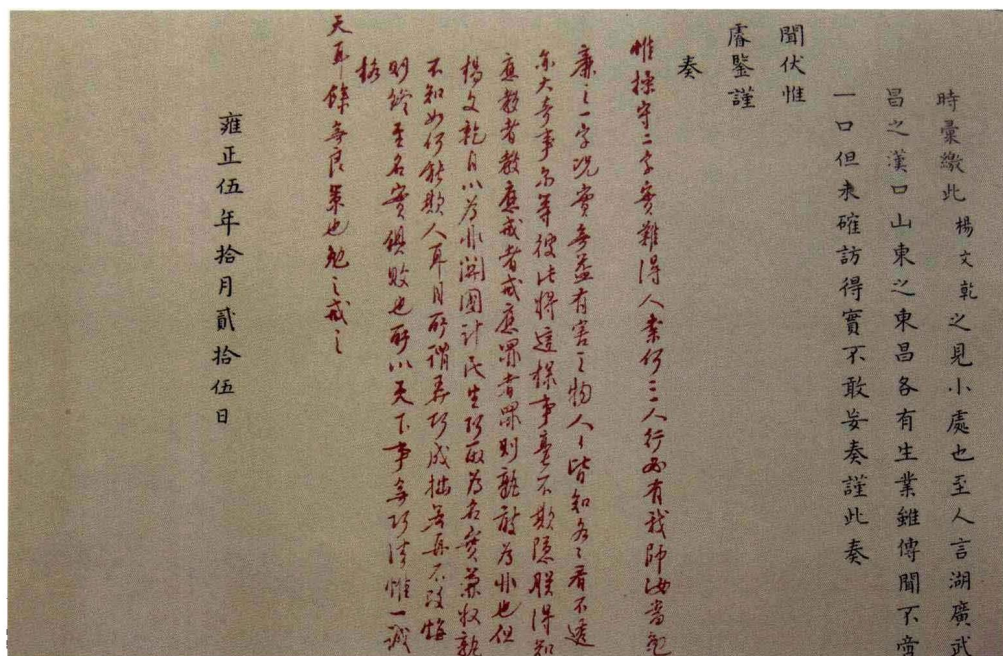
广州商馆前的货运码头



十三行外景



内阁大学士张廷玉等关于取消“加一征收”的奏折（乾隆元年）



雍正痛批杨文乾“名实兼收”的著名朱批（雍正五年）

目 录

导 论	(1)
一、洞开国门的几个“瞬间”	(1)
二、一场信息的反向流动	(4)
三、两个历史的逻辑	(6)
四、准确“重建”当年中西关系	(8)
五、一道打开中国近代的历史之门	(10)

第一编 从康熙开海到乾隆限关七十三年史述

第一章 全球视野研究下的中国海贸史	(15)
一、对十三行的历史主角——行商的再认识	(15)
二、康熙解除海禁实录	(22)
三、早期行商黎谭陈三大家考	(26)
四、市舶制度的终结和中国海关制度的开始	(34)
五、康熙颁布“南洋禁航令”史实	(38)
六、康熙五十九年公行设立“无疾而终”	(38)
第二章 雍正开洋从严至宽之考证	(42)
一、雍正登基坚持“海禁宁严毋宽”分析	(42)
二、雍正五年：取消“南洋禁航令”	(44)
三、大航海时代抗争赋税的形势	(49)
四、从公行到商总的变化	(53)
五、杨文乾“统一”税项：番银加一征收	(58)
第三章 抗拒加一征收，维护国际自由公平贸易	(62)
一、外商冲衙门事件及肇因	(62)
二、外轮拒不进港丈量之交涉	(66)
三、大班再度为加一征收上诉	(69)

第四章 官商勾结，舞弊经营	(77)
一、内外勾结：陈寿官与不法外商的舞弊	(77)
二、官商垄断：祖秉奎庇护陈寿官	(79)
三、祖秉奎扣普济堂款之“官式思维”	(80)
四、遵循国际贸易原则：谭康官告洋状	(83)
第五章 行商艰难的营销环境	(88)
一、谭康官何以连遭不测	(88)
二、外商日志中商总谭康泰三次入狱的记载	(90)
第六章 雍正皇帝确保“开洋”	(96)
一、海关监督祖秉奎受到严惩	(96)
二、雍正恍悟与宾天	(97)
第七章 乾隆登基，空前的开放与优惠	(101)
一、六位重臣的奏折与加一征收的终结	(101)
二、两个根本对立的商业集团	(106)
三、顽固的行商及其人格魅力	(109)
第八章 开放的逆转	(112)
一、开洋变成“限关”的根本原因	(112)
二、杨宗仁、杨文乾、杨应琚祖孙三代对“限关”的作用	(114)
三、先行发生在南方的礼仪风波	(116)
四、中国没有做好接受自由贸易的准备	(121)

第二编 行商 封疆大吏 皇帝 民谚

第九章 十三行：从官商到民商的历史性转换	(129)
一、明代对外贸易与十三行行商	(130)
二、清初：不同背景的官商走马灯似地上台台下	(135)
三、追求自由贸易，反对官商勾结	(141)
四、公行的确立与民商身份	(148)
五、十三行商人的民商本质	(154)

第十章 封疆大吏对清代对外贸易的作用与影响

- 以杨宗仁、杨文乾、杨应琚祖孙三代为例 (163)
- 一、杨宗仁：老成练达，有守有才 (166)
- 二、杨文乾：夷银并非公帑，再贪亦无妨 (168)
- 三、杨应琚：给开放插上致命的一刀 (172)
- 四、两条相抵牾的轨迹 (181)

第十一章 从公行制度的几度设废看十三行商业工具性质 (182)

- 一、公行制度的形成 (182)
- 二、公行的设立与撤销 (184)
- 三、利益与自由 (189)
- 四、公行与东印度公司的比较 (194)

第十二章 乾隆初期粤海关赋税被减免的缘由及其文化意蕴 (198)

- 一、中国与西方的关税制度 (198)
- 二、加一征收与朝贡制度 (200)
- 三、乾隆初期的宽政与清朝官员的作用 (2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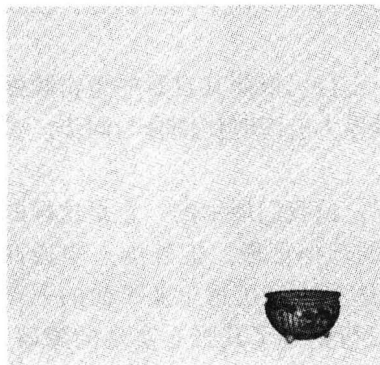
第十三章 十三行的谣谚与小说 (212)

- 一、海洋文明在南中国 (212)
- 二、潘卢伍叶，谭左徐杨 (213)
- 三、火烧十三行，越烧越排场 (215)
- 四、算命先生的玄机 (220)
- 五、谣谚的“回归” (224)
- 六、历史的咒语 (224)
- 七、与十三行同时代的《蜃楼志》 (226)

附录 谭元亨的四篇关于十三行的参事建言 (228)

后记 (244)

参考文献 (246)



导论

一、洞开国门的几个“瞬间”

历史之门、历史的十字路口、历史的节点……

人们常用这样的字眼，表述历史的确定性或非确定性——诸如，历史每每要进这一扇门，却阴差阳错，进了另一扇门；历史走在了十字路口，每每有瞬间的闪亮发出了导引；历史呈现一个又一个的节点，而这，构成了非凡的篇章。

的确，在历史进程中，总是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入口，展现出扑朔迷离的十字路口，呈现出令人迷醉的节点。炎黄二帝逐鹿中原，春秋战国的连横合纵，楚汉之争中的鸿门宴，唐初的玄武门之变……历史在这瞬间，抑或转折，抑或飞跃，抑或逆转，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由于种种机缘，可能成了不可能，不可能却又成了可能，且不道远至大陆另一端的滑铁卢之役，仅我们这边，便已说不尽、道不完了。

也许，这正是历史迷人的魅力所在。秦时明月汉时关，大明宫与始皇陵，万里长城与南北运河，时光流逝，故垒犹在，当年的豪情未减，人的历史感不仅仅拘于对历史真相的怀旧与追忆，更在于对今天的某种确认。我们守护历史，其实守护的是人类的尊严与自信，以及这一尊严与自信所面对的未来。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来到了历史的一扇门前——广州十三行。

说十三行是历史之门，是因为十三行的出现与中国历史上热兵器的出现发生在同一个历史时期。众所周知，冷兵器与热兵器的交替，一直被视为古代与近代历史的分界线。当年，即明代的屯门之役，正是中葡两国的热兵器第一次交锋，

所以，历史学家也就以此为据，认为中国自此进入了近代。而广州十三行也在这时成为中西贸易的开端，并在几百年间，在世界的大帆船时代中风生水起，独领风骚，对中国与世界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虽然经历了明清更迭的天崩地裂的岁月，但十三行仍依照其自身的逻辑顽强地延续了下来，历史之门依旧敞开，中国亦应与世界大航海时代耦合与同步。曾几何时，历史竟又走进了另一扇门……

时至今日，无论是教科书，还是学者们的笔下，给我们展示的一直是这样的图景：这边是自命为“天朝上国”的清王朝，虚弱却偏倨傲，把外国人来通商视为“进贡”，而十三行则是典型的贡舶贸易；那边是刚经历过工业革命的大英帝国，野心勃勃，视中国为正待开发的市场，十三行则成了其野心实现的障碍，欲除之而后快。

这样的图景，在不少人看来，都是理所当然、无可厚非的。后人读起来，似乎也没什么可质疑的，这本就是历史的理性，历史本“应该”如此。

然而，历史很少有成为“公理”而无须论证的，尤其是从十三行切入实际，我们就发现，上述的图景似乎缺少了什么，而一旦把这短缺的东西补上，整个图景也就会发生某种置换，不是我们无须论证当然的一幕。

这里举出一例，早在康熙当政之际，便已把朝贡与通市区别开来，诸如暹罗、琉球，自是属于朝贡范围，而朝贡则有朝贡的惯例；而与西方的贸易，则视为通市，通市有通市的原则与规定。所以，称清廷把十三行视为典型的朝贡贸易，则大谬特谬也。

由此推论，视十三行行商为“官商”，也同样错了。虽然明末清初著名大学者屈大均有诗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外洋。五丝八缎广丝好，银钱堆满十三行。”诗中讲的是“官商”，但请注意，屈大均写诗时，活跃在十字门、十三行的，则是尚之信麾下“王商”或“藩商”，其时，正是清初藩镇割据之际。

也就是说，康熙开海禁之际，十三行是以“通市”为主，朝贡则另有他处，因为十三行接待的主要是来自葡萄牙、荷兰、英国的西方商船。

众所周知，康熙对西学从来没有采取排斥的态度，对吸收外来文化，有着前后所有帝王所不曾有过的开明态度。他的一生，以极大的热忱，学习西方科学，新发现的众多满文档案资料，都记载了他孜孜不倦学习先进的西方科学的历程。这里值得添上一笔的是，在他平定藩镇之乱时，正是采用了“红衣大炮”（把明代所叫的“红夷大炮”改了一字）才大获全胜——南怀仁受命铸造西洋铳炮以平吴三桂，康熙称其“艺能兼备，铸为军器，较旧式而呈奇；用以火攻，佐中

坚而制胜”^①。所以，白晋在《康熙皇帝》一书中称康熙“皇帝具有非凡的远见卓识。他早已认识到中国对外国人抱有成见的错误偏见”，“他相信，中国并不是唯一的文明国家，除中国外，其他国家也有科学家及能工巧匠”^②。

取消“夷”而换为“衣”，则说明康熙并未接受宋明以降的“华夷之辨”观念，诚然，如以前朝观，满人也当归入“夷狄”之列了。哪怕在他晚年的南洋禁航令中，也不曾禁止西方商船前往十三行贸易。

同样，乾隆登基，亦立即取消了历朝贡定制“加一征收”——为此，西方进入广州的商船已抗争了近10年，每年都先泊在外洋而拒不进港，所以，得到新皇帝这一“圣谕”，法国人还在商馆“焚香顶礼”，齐颂新帝开明。事实上，当时的法国，包括伏尔泰等著名思想家在内，亦一直以中国为例，推崇“开明君主制”。

照此逻辑，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宣布开海禁，雍正五年（1727年）宣布废除南海禁航令，乾隆元年（1736年）更撤销“加一征收”，从十三行这一层面上看，开放的格局在一步步形成，而且愈来愈有利于与国际“接轨”（姑妄借用今天的话语），历史似乎已经确定进入这样一扇开放的大门了。

换句话说，当时的中国，已面临一个极好的发展机遇——即便到了已由盛转衰的道光年间，中国的GDP仍占世界近三分之一。而乾隆前中期，这个比例则更大一些。然而，又是为什么，历史却又进了另一扇门，一扇“限关”的门？

有人把英商洪任辉北上闯关视为“一口通商”的肇因，但是，乾隆受理洪任辉的诉状，已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而颁布“一口通商”上谕，则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而此前，乾隆皇帝曾几度下谕，试图完善宁波等口岸的外贸制度，甚至把两广总督调去任闽浙总督，好把广东十三行的经验带去。著名的清史学家戴逸称：

如果允许浙江开埠，中英贸易由于更加接近茶、丝产地而获得发展，江浙富庶之区将被带动起来，广东的外贸垄断体制遭遇挑战，浙江和广东在招揽贸易方面将展开竞争，很可能会引起贸易规模和中外交往的迅速变化，产生有利的影响。^③

但历史并未按这一理性的逻辑演进下去。所以历史的机遇也就转瞬即逝。

.....

上面的例子，也许不同的学者，出于不一样的视角，会有不同的阐释，但

① 转引自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166页。

② 白晋：《康熙皇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2页。

③ 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20页。

是，基本事实却是不可否认的。那么，在这几个“瞬间”中究竟敞开的是怎样的“历史之门”，使得中国在18世纪面临过怎样的机遇或失去了怎样的良机，从而导致了整个19世纪无法挽回的败落的悲剧？

二、一场信息的反向流动

长期以来，对十三行的研究，学者们都注目于“一口通商”之后的十三行，而且，更集中在19世纪即1800年之后的十三行。著名学者、十三行天宝行后裔梁嘉彬的名著《广东十三行考》是如此，这么多年来，关于潘家、伍家以及梁家等的研究论著也同样如此，关于公行、行佣、口岸制度的研究也大抵如此。

一般认为，十三行后期的资料，由于距今的年代相对要近一些，所以留存下来的也要多得多，人们做起研究来自然会轻车熟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包括外国的史料记载，也较多集中于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加上美国本就是18世纪末才独立，他们对档案的保存，也是自建国之后。所以，大量的中外研究成果都集中在此。

而且，这个历史时期，十三行本身的制度也相对稳定下来，以至于有人认为十三行是“一口通商”之后才建立的，如公行正式恢复于1769年，11年后撤销，但没过几年又重建了，而且一直延续到了鸦片战争时期，与十三行同归于尽。由于制度的稳定，行商虽然走马灯似地更换，但最终还是出现了诸如潘、卢、伍几大行商，富甲天下，他们的经商业绩精彩纷呈，辉映了整个世界，如瑞典王接见潘启官、伍家投资美国的太平洋铁路，等等，乃至鸦片战争中，无论毁誉，行商更充当了一个无可替代的角色。这些，不能不引起研究者们高度的关注。

这样一个时期，既有炫目的历史礼花，也有深不可测的历史黑洞；有让后人值得炫耀的功绩，也有让有志者扼腕的沉痛。对于学者乃至文学家们对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行的注目礼，我们无可非议。

尤其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中，我们表达对一个封建王朝闭关锁国无可奈何的哀婉与谴责，对西方列强的肆无忌惮的霸权主义之愤慨与批判，都可以淋漓尽致地得以发挥——这也寄托了整个20世纪中国人上上下下几乎一致的反思与觉悟，凭此，无论中国还是外国，关于这方面的表述也大都趋于一致。我们都还记得，20世纪改革开放之初，法国学者佩雷菲特所著的《停滞的帝国》一书译介到中国，在中国高校中曾引起怎样广泛的反响。该书《译者的话》中一段，当可代表当时整个学界的心态与认识：“闭关锁国只能导致文明与国家的衰退，无力抵御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记取这一历史教训也可使我们今天更坚定地走改革开放

的道路。”^①

就这样，马尔戛尼率祝寿使团访问中国之前，“一口通商”国策最后确立之前的十三行，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忽略了。

纵然从康熙开海禁至“一口通商”，经历了三个皇帝——康熙、雍正、乾隆，而且是大清帝国走向鼎盛的历史时期。

纵然这一时期也长达70多年，与“一口通商”的80来年不相上下。

如果说，后80来年，大清王朝的历史选择已经作出，十三行的命运已经注定，那么，前70多年，大清王朝又是怎样进行选择，十三行又是怎样处于变数之中的呢？

诚然，这样一个时期相距我们要远一些，而处于变动的岁月中，留存下来的史料也许要难找得多，人们的关注度也自然要低一些，研究的难度也就相对大了——当然，这理由并不充分，因为这具备的挑战性也大得多！

关键在于，研究这样一段历史时期的意义何在？尤其是对今天的警策如何？换句话说，它的现实意义怎样方可凸显出来？

这也是这本专著为何把目光聚焦于这样一个历史时期的理由。

当笔者涉足到这一历史时期之际，无论资料的多寡，都要面临一个重大的挑战，尤其是进一步深入下去，甚至会对既往已形成的定见，或者某些历史的结论，进行前所未有的颠覆，我们当看到的，是与过去已在头脑中产生的图景完全不同的一幕，是似乎混乱却又鲜活、似乎困厄却又自由的一幕。

也许只是巧合，在康熙决定解除海禁的前几年，即1681年，与康熙同时期的法国君主，有“太阳王”之称的路易十四在法国科学院派人到世界各地去考察其地理并绘制航海地图时，就已在酝酿如何与中国皇帝联系的事了。也真巧，正是康熙宣布开海贸易的同一年，即1685年，“太阳王”终于派出了第一个科学传教团出使中国，这个使团正是由日后在中国赫赫有名的神父洪若翰、白晋、张诚、刘应、柏应理、李明——他们都“入乡随俗”，起了个中国名字——所组成。这一年的三月，带着“太阳王”授予的测量仪器于布雷斯特出发，两年后，先抵达宁波，再过半年，奉康熙之命，到了北京。其中，张诚、白晋则留在了康熙身边，成了康熙的老师。

可以说，康熙在东方，也同样具有“太阳王”的辉煌。他与路易十四一样，都是冲龄即位，而且，全凭自己的雄才大略与过人的智慧，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使国家走向了鼎盛——这边是康熙盛世；那边则成为欧洲的强国、欧洲的科

^①（法）阿兰·佩雷菲特著，王国卿等译：《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3页。

技文化中心，甚至向东方派出了一批科学家。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发现，清初、中期，中国与法国的关系要密切得多，法国甚至比英国早在澳门设立了贸易办事处。当然，法国的神甫兼科学家、技工、画匠，也一直占首位，上边提到的张诚，还参与了中俄划界的谈判，甚至代表中国出使俄国。

而康熙，一直在努力学习西方，不仅是科学技术，也包括人文学科，如哲学等，他完全接受了“地圆说”——这在前边已提及了，他接受科学，但对传教则始终保持警惕，与此同时，白晋在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离京返回法国，给“太阳王”带去了康熙的礼品，其中包括一些中国的经典与科学著作（共49卷）。很快，不少著作被译成了法文，其中有的成了反对神学、推动启蒙的思想武器。

正如法国当代学者所说：“在18世纪，大家实际上是目击了一场信息的反向流动，主要是欧洲向中国学习。”^①“发现和认识中国，对于18世纪欧洲哲学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正是这种哲学为法国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②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甚至写上了法国大革命的旗帜。

而中国的“开明君主制”，对法国的大思想家如伏尔泰等，亦不无影响。笔者在同时完成的长篇历史小说《开洋——国门十三行》中，就专门写了一位醉心于“开明君主制”的十三行的法国商办主任。

平心而论，此时的中国，无论在经济上、文化上，都有很多方面领先于世界。而对外开放的态势，也并不是后人所认为的那样。忽略这些，认为此刻的中国便已经僵化、保守，井蛙观天，实在与事实相去太远。

本来，通向世界的这一历史之门，已然洞开了。

三、两个历史的逻辑

为此，这本书选择了这70多年——被大多数史学家忽略了的一段历史。

在法国人认可的“开明君主制”下，中国这70多年的一步步开放，从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帝王诸多关于开海、免税以及与十三行相关的御批及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而言，当有不少可圈可点的地方。

^①（法）詹嘉玲：《18世纪中国和法国的科学领域的接触》，载《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56～60页。

^②（法）谢和耐语，转引自张芝联主编：《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页。

同样，在大清各级官吏中，为民请命，拼死要求开放海禁、洋禁，以及免除各种缴送、税项的，亦不乏其人。他们关心民疾，视国计民生为己任，加上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的主导，出于公心，敢于犯颜直谏，令人感奋。

尤其应突出的是，走在开海贸易前列的十三行行商，早期他们便自然褪不去官商的色彩，但随着与国际商贸相衔接，加上国家政策的相应调整，他们便很快向民商、向自由商人靠拢，而且，也正由于他们的努力与抗争，对外贸易才一步一步褪去朝贡的色彩，最后形成真正的通市，即商品经济……

仅这么简单点上几句，就已经很明白了，在这 70 多年间，中国曾面临多少的机遇，有可能与正在逐渐成熟的国际贸易的准则相适应，有可能更多地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从而不再忧虑“岭门开后少坚城”，有可能在梯度的开放中，接受西方迅速发生的启蒙主义、人文主义思潮——行商中已不乏这类先见者，有可能清中晚期不至于发生逆转，走向腐败与衰亡。当然，历史没有这么多的“可能”与“假如”，已发生的一切均已无法改变。

那么，这 70 多年中，我们曾有过怎样的机遇？同样，行商或者相关官员有过怎样的抗争？而其间我们又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又为何在一路畅行之际，突然进入了另一扇门，令已进行得相当到位的开放最后发生了逆转？

这些问题，哪怕在今天，在我们的改革开放已进行了 30 多年之际，一样是那么振聋发聩——与这 70 多年相比，我们的开放时间还不到一半，而我们尚须进一步开放的内容，还很多很多，不仅仅到加入 WTO 为止。因此，选择这 70 多年来进行深度的研究，对今天而言，有着更现实更重大的意义。

我们当有更明白、更直接的历史之镜。

在那 70 多年中，于中央层面而言，似乎也有两条历史的逻辑线。

一条是以康熙开海，接受法国科学使团、制造热武器为开端，而后则是雍正废除了南洋禁航令，雷霆出击，严惩了中外不法商人与官员的勾结、破坏正常的罪行，及至到了乾隆，便是废除加一征收，取消缴送，给予外贸优惠政策，乃至设法完善除广州之外的其他几大海关的制度与政策——如果照此发展下去，大清中期，其开放的格局也就得以完成，尤其是边关热武器的使用与提高，从而也就不会有日后被英军几千条枪打得国不成国的样子。

而另一条，则是康熙开海后，晚年被地方官员忽悠，又颁布了“南洋禁航令”，从宽容到“禁教”，并祸延到科学技术之引进。而后，便是雍正开洋后，却默许广东巡抚杨文乾再度恢复朝贡制度的“加一征收”以对付日趋繁盛的西方商船的到来，一直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的“一口通商”、《防夷五条》——日趋严厉的对外限制，终于在其中晚年，令整个大清帝国由盛转衰……

我不知道，是否曾有人作过以上的梳理。

至于官员，有力促康熙开海贸易的，也有以种种借口延宕乃至反对开海的；有向雍正申明“禁洋”之弊端的，也有于海关巧立名目设立繁多税种的。当然，更有在乾隆“一口通商”决定中发挥极其恶劣作用的——这期间，杨宗仁之于康熙，杨文乾之于雍正，杨应琚之于乾隆，这杨家三代人对广东封疆大吏的承袭，所造成的恶果恐怕难以三言两语说得清了。

但我们更应该把目光投落在十三行行商头上。

毋庸置疑，商人、第三阶级等，在那样一个时代，均具有革命性的因素，这已不用我们多加阐释了。十三行行商，这批经营大规模的外贸业的历史骄子，在那样一个世界大航海时代，秉承传统的“通商裕国”的理念，求新求变，求与国际市场交融在一起，且带来了全球先进的文化思想，其作用再怎么高估也不为过。

而在十三行中，从早期的藩商、王商，及督商、将军商人，渐渐演变为有相对独立身份、乃至独立人格的具有自由商人色彩的民商，可以说有一个相当艰巨的蜕变过程，毕竟，他们是在封建大一统的制度下生存、经商的，不得不受到种种制约。而这个演变过程，恰好就在这70多年当中，尤其是中期，那些坚持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则，不仅敢于与官商勾结者抗争，更敢于告“洋状”、揭发外商的不法行为的行商，该担多大的风险，有的倾家荡产、籍没流放，有的甚至几度入狱。然而，正是他们的抗争与牺牲，表现出一种可以面对那个时代与环境时超前的思想，为后来十三行行商成为真正的民商扫清了庭院，为他们摆脱或屏蔽掉官府，让整个世界去经营其商业、金融业打下了宝贵的基础。

应当说，对于行商的整体而言，他们并没有另一条历史的逻辑走向——还原为封建体制下的官商。他们只能向前，义无反顾地向前，哪怕十三行毁灭了，也仍在坚持其作为具备近现代商人、实业家的身份与原则，为日后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及辛亥革命廓清了道路。

因此，把研究的重心放在行商身上，是不二之选。正是他们，创造了机遇，抓住了机遇，在无论怎么艰苦卓绝的时刻，矢志不移，走着自己的必由之路！

这也是十三行的灵魂所在。

抓住这70多年波诡云谲的历史变化，我们当有更多的发现与感悟！

四、准确“重建”当年中西关系

以上，只是简单概括了那70多年间在十三行这样一个对外贸易的历史舞台上，各个层面人物的表现：动摇、彷徨、抗争，等等，当可谓波澜起伏、错综复

杂，亦丰富多彩。

可惜的是，过去对十三行的研究，偏偏忽略了清代中前期这一历史时期，忽略了这个时期最为精彩也最为复杂、最为深刻也最为迷惘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诸方面的内容；从而对其间态势上、政策上的进一步开放，缺少到位的、切中肯綮的探讨与研究。也正因为这一段研究的缺失，对一口通商的逆转，以及一口通商之后整个中国对外贸易的曲折，失去了必要的、合乎逻辑的历史依据，对其来龙去脉的梳理，也同样发生了主观认识上的错误，这一来，对整个十三行历史的把握，也就有了严重的畸误与错位。

时至今日，我们已比较清晰地看到，时逢大航海时代，十三行行商的身份从官商演变为民商，他们锐意进取、求新求变，在开拓国际贸易，传播启蒙主义、人文主义思想上功不可没；而 they 与贪墨、守旧的官员之间的斗争，亦可歌可泣，这也最终使得十三行成为闻名世界的一大商群。正是在这么一个复杂的大背景下，保守思想与开放意识，封建专制意志与近代国际贸易原则的相互角逐、博弈，为雍乾初期行商与外商之间的“贸易混乱”的发生创造了环境。

如果沿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中国开放的格局显然不同。然而，历史却每每有太多的或然率。

雍乾初期十三行所进行的中外经济活动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时刻，这甚至可以作为解读整个十三行演变的一把钥匙。从最近新发现的史料中可以看到，十三行行商在清朝康熙、雍正及乾隆早期时候，就已经在中西经济文化交往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有鉴于此，以十三行行商为研究对象，介绍并分析雍乾初期行商与外洋大班之间的经济往来，进而探讨为何那一时期行商会形成先进开放的经济贸易思想，为什么这些思想使得行商遭到惨痛的经历以及为何中国没有进一步开放贸易，反而导致清廷从“开海禁”、“四口通商”逆转为“一口通商”这种保守的对外政策出台，由开放走向限关锁国，形成这一不合事物发展逻辑、前后矛盾的历史逆转。

正由于我们未能较准确地“重建”当年中西关系的历史，方才出现种种误区，只简单认为西方早已比我们先进，包括对行商真正的历史作用也缺乏全面的认识。

要把握住十三行，当首先着力把握住十三行行商；要真切了解清朝从“禁海”到“开海”，从“禁洋”到“开洋”，又从“开洋”至“限关”的政策演变的大起大落，无疑须抓住清代前中期（尤其是康雍乾）这个历史时期；从整体上把握皇帝、封疆大吏、行商、外商在“禁、开、限”博弈中的立场变化、利益消长与关系互动，揭示这一历史发展过程的规律。正是这些，构成了这个年代最为精彩也最为深刻的历史内容。可以说，这才是整个十三行研究的枢纽，是